

國際新聞的「馴化」： 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

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

《摘要》

新聞記者如何令本國的受眾對國際事件感到興趣及有意義？這是我們主要探討的問題。本研究希望透過各國媒體對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這個全球性事件的報導，來分析新聞工作者「馴化」新聞事件的過程及其後果。這裡，馴化指的是新聞工作者強化一個外在或全球性事件對本國受眾相關性的過程。我們發現，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記者在製作國際新聞時，往往依賴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權威、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此外，影響馴化的因素還包括傳媒類型、市場定位、組織約束和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了解的程度。我們的比較研究顯示，媒介意識形態在國家之間的差異一般要比國家內部的差異顯著。

關鍵詞：國際新聞、馴化、香港回歸、新聞價值、全球化、本土化

* 本研究承蒙香港的大學撥款委員會資助，在出版過程中更得到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不少有用的意見，謹此致謝。原稿為英文，首先發表在中華傳播學會在 2001 年 7 月於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年會，本文是根據譯稿修訂改寫而成。

** 作者陳韜文與蘇鑰機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授和副教授；李金銓原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大眾傳播學院教授，現為香港城市大學英語與傳播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潘忠黨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傳播藝術系副教授。陳韜文教授 E-mail: jchan003@yahoo.com

1997年7月1日，來自世界各地代表了778個傳媒機構的8,000多名新聞工作者匯聚香港，共同見證香港主權的移交。這一交接儀式的歷史與政治意涵深遠，象徵著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以及西方與東方等等這一系列基本價值的碰撞。對傳播學者而言，香港回歸是一「全球性事件」（Dayan & Katz, 1992），為各國傳媒提供了一個場域和時刻，讓它們表達各自的價值觀念。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個傳媒表述的過程，探討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工作者如何將一個全球性事件「馴化」，即如何強化事件與本國受眾的相關性。本文同時也想探討「馴化」在新聞內容方面有甚麼效應。

何謂「馴化」（domestication）？稍後我們會對這一概念詳加討論，但這裡先以具體例子來闡明它的基本含義。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出版了以香港為主題的封面故事，但是它的國際版和美國版卻採用了不同的封面：國際版是「紀念專刊」，封面所呈現的是香港的摩天大樓，標題是「倖存者的土地」（Land of Survivors），而美國版的封面則是一個雙眼被蒙上紅綢帶的女模特兒的大特寫，標題為：「中國接管香港——香港能否生存？」（China Takes Over Hong Kong - Can it Survive?）為什麼《新聞周刊》對同一則報導採用兩種不同的封面？

一般來說，外國題目很少能夠登上《新聞周刊》美國版的封面，因為在美國，除了英國戴安娜王妃的故事，任何國際新聞題材都會減低雜誌的銷量。《新聞周刊》的主編 Maynard Parker 認為，關於中國的新聞其實已經是影響銷量最小的國際新聞，但是即使是像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這樣一個與1989年以來共產主義政權崩潰世界潮流相逆的新聞事件，也不足以「攔住」美國觀眾的注意力，正由於此，Parker 才決定在封面上加上一個引人注目的問號，給這個故事注入「激素」，刺激讀者收看的興趣。顯然，這個問號所隱含的不確定性是富爭議的，但是它卻切合美國國內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即人們會普遍懷疑香港這顆「明珠」落入共產主義之後的命運。這則故事無疑是國際新聞馴化現象的最佳寫照。

壹、馴化的概念

所謂「馴化」，指的是新聞工作者通過種種方法強化外國事件對本國受眾的相關性，和把它納入民族國家的論述的過程。馴化的意念由 Cohen 和他的同僚（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首先提出，認為本國的受眾往往關心的是

本國「此時此地」的新聞，而爲了使他們注意、熟悉和認知那些發生在遠方的事件，或者說要改變這些外在的事件的「野生狀態」，新聞工作者就必須對外國新聞事件重新建構，使之與本國政治、文化和歷史系統發生意義關聯。「馴化」是個比喻，它英文的原意是指將野生（因而是外來的、不確定的、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動物馴服成爲家畜的過程。當然，這裡要馴服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國際新聞。新聞工作者多是採用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框架來賦予事件以意義，因而將「那些難以認知的事件或空洞的談話轉變成爲可以辨別和認知的事件」（Tuchman, 1978: 192）；倘若沒有馴化這一過程，外國的新聞事件的認知性就會大打折扣。國際新聞的馴化因而可看作是一個「維持現實和平衡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的程序（Berger & Luckmann, 1967: 167）。

透過馴化，新聞工作者不但將國際新聞事件修裁得更符合本國新聞消費者的需要，還可以將外國的議程轉變爲本國的議程，使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得以「再生產」。根據 Gans (1979) 的觀察，美國傳媒中的國際新聞通常是通過純粹本國視角來呈現，總是反映着美國國務院的說法。Hallin & Gitlin (1994) 的研究也表明，在對波斯灣戰爭的報導中，美國傳媒總是致力於強調波斯灣戰爭的「本國向度」和與本土的相關性。Lee & Yang (1995) 在對天安門事件之報導的研究中則發現，美國和日本的傳媒對天安門事件給予不同的解釋，這主要是因爲彼此服務於不同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

通常來說，傳媒在選擇新聞來源的時候，所依賴的是「權威性、可信性和可獲得性」這三項標準（van Ginneken, 1998），但是不同國家的傳媒對這三項標準的運用會有差異，因而影響到「新聞網」（Tuchman, 1978）之具體構成。由於這些標準的運用往往是在社會菁英達成共識的領域，和一般可接受的話語領域內進行（Hallin, 1986; Bennett, 1990），因此它總是有利於官方新聞來源，其它聲音則被邊緣化。記者和其他人一樣，也生活在「一個常識世界之中，所謂常識，就是說種種事物、事實及關係的意義是不證自明的，都已經被人們想當然地接受」（van Ginneken, 1998）。而且，記者們還通過社教化過程接受更爲廣闊的文化、專業意理以及組織要求，這個過程使記者們進一步肯定那些被視爲理所當然的現實（Tuchman, 1978; Schlesinger, 1978）。基於此，新聞記者們總是帶著一系列刻板印象出發到另一個國家，而帶回來的則總是對異國文化固有的詮釋和對自己預想的再肯定（van Ginneken, 1998）。

馴化也是出於受眾以及傳媒組織自身的需要。Cohen (2002) 指出，由於受眾

並不一定擁有理解國際新聞的能力，如果新聞不被置於為受眾熟悉的本國情境之中，觀眾們就很難了解這些新聞。新聞廣播一般是由一系列連續的新聞條目或情境構成，中間沒有停頓，彼此之間並無聯繫，而且很少提供每一則新聞的背景。因此，除非將一個外國事件放在一個為觀眾所熟悉的文化框架下進行報導，否則觀眾很難理解。而從傳媒組織來看，派出海外記者必須有充分理由，尤其是在如今國際採訪成本高昂和通訊社發達的年代，是否需要特派記者更是有待斟酌的事情。花了這麼多資源而不能為受眾提供獨特而本土化的觀點，就難以交代。我們可以說，只要有市場競爭，無論是為了經濟或是組織原因，馴化都成了必要做法。

從認知的角度來說，事物的意義愈是不明確，感知者主觀意識的影響就更大（Fensterheim & Tresselt, 1953）。Hall（1974）也認為，傳媒的標籤作用在對人們不熟悉或者意義不確定的事物會產生最大的效果。國際事件和國際現實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新聞工作者必須設法使之符合既定概念，從而把意義確定下來。即使面對像《紐約時報》和英國的《衛士報》（The Guardian）這類菁英報紙的讀者，新聞工作者也須如此，因為他們知道讀者對別人的政治往往缺乏興味，同時缺乏了解的認知基礎。為了使乏味的政治變得有趣，讓陌生的事件為人們熟悉，新聞記者就必須運用框架建構新聞事件（Goffman, 1974），通過典型化（typification）將未知的現象置入已知的概念範疇。

不過，新聞記者們所持的觀念並非隨機，而是具有國家和文化背景的。我們同意 van Ginneken（1998）的看法，即認為民族國家是國際現實的主要界定者，而傳媒則只是第二位的界定者；國際事件的不確定性使政府官員以及其他擁有制度權威的人發揮更大的詮釋功能。新聞工作者不一定是國家外交部門的「喉舌」，但他們卻很少質疑這些外交政策的前提。國際關係是國際新聞的核心，而國際關係總是與相互競爭的國家利益密不可分。為了權力或者利益，強國往往傾向將自己的世界觀，通過界定國際事務的話語邊界，強加於其他國家。國際新聞因而有時成了國際事務「話語鬥爭」的延伸。

在國際話語領域，最重要的是與國內政治權威和利益關係密切的民族國家，而民族國家內部的差異則往往存而不論（Sreberny-Mohammadi, 1991）。全球化的過程可能在個別方面削弱了人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但是民族國家仍然在當代政治中佔有重要地位。東歐自共產主義政權崩潰之後，民族主義已告復興，如在南斯拉夫，其內部的不穩定還觸發了激烈甚至帶有破壞性的「身份」鬥爭，導致了種族屠殺。因此，全球化不應看作是「一個完全顛覆民族國家的過程」，而民族國家仍

然是「建構全球化過程中強而有力的因素」（Sreberny-Mohammadi, Winseck, & Boyd-Barrett, 1997: xi）。

馴化也可以放到全球化論述中來考察。「全球化」是一個有用但卻難以捉摸的概念，支持者和懷疑者各半。雖然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愈來愈相互依賴，但中心與邊陲之間的分化卻愈來愈劇烈。不管怎樣，在現今全球化的世界裡，時空無疑已被「壓縮」（Tomlinson, 1999），社會關係莫不與遙遠的地方性相連，互為影響（Giddens, 1991），而社會和文化安排的地理限制也愈來愈弱（Waters, 1995）。不過正當全球化上升時，人們意識到本地化的重要性。全球化與本土化是一對相對的概念，二者意涵相互構成。全球化表明的是特定事物的普遍化，而本土化則指的是普遍事物的特殊化，二者是一物兩面，不可分割。地方性事件可能會脫離那些原初產生它的社會關係而進入一個新的軌道，這種地方事物的轉型正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時空雖已被壓縮，但時空的界限卻並未完全消除（Wang, Servaes & Goonasekera, 2000; Chan & McIntyre, 2002）。全球化的觀點常常談論「地理的終結」和「主權的終結」，誇大去域化的程度（Scholte, 1996: 51）。事實上，時間和空間仍然存在，且是地方性得以在全球化時代產生影響的重要基礎。Robertson（1995）採用「球土化」（glocalization）這一概念，來表達全球和地方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那是最貼切不過的事。

從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脈絡來看，馴化的意念跟本土化或在地化是相通的，可說是本土化在新聞方面的應用。所以，上面有關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的討論也適用於馴化問題。馴化和本土化大概是兩個可以互換的概念，但是 domestication 的概念自 Cohen 等人提出後，在新聞分析時或會用上，是以我們這裡也跟隨這個小傳統。

貳、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項大型研究的一部分（Lee, Chan, Pan, & So, 2002），結合使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包括(1)與各國新聞工作者的訪談，(2)內容分析以及(3)對來自八個國家和地區的菁英報紙和電視的話語分析。本文採用的主要是前二者。話語分析的結果請參見本研究項目的其它研究報告（Pan, Lee, Chan, & So, 1999; Lee, Chan, Pan, & So, 2002）。在對新聞工作者的訪談中，所問及的內容包括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經歷、傳媒組織的資源與組織策略、新聞競爭與合作、以及指導他們報導香港主權移交這一事件的「文化地形圖」。我們也搜集和翻閱了衆多已發表的公開文件、新聞報導以及一些相關的座談會摘要，以了解新聞生產的具體過程。我們還參與了一些新聞事

件，以觀察新聞記者如何與新聞人物互動。

一、國家與傳媒選樣

爲了解香港主權移交這個新聞事件，如何通過民族國家這一稜鏡的折射而展現出來，我們選擇了來自以下八個地區的傳媒體系進行研究：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如果依主權移交的相關性而畫成圈層的話，這些國家和地區分別位於圈層的不同位置。最核心的圈層是所謂「文化中國」（Tu, 1991）的主要構成部分，即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這三個地區在身份認同和歷史記憶上充滿了重疊和矛盾。倘若把相關性之圈層擴大，中國大陸則與其外部世界具有相當強烈的意識形態矛盾，是東西衝突的一部份。不僅即將離去的英國聚集所有道德、政治和傳媒資源，以面對中國對其合法性的挑戰，美國更在這場文字和影像遊戲之中，領導一個西方意識形態的聯合陣營支持英國，反對中國。被納入這個西方陣營中資歷較低的其他成員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日本也是，這些國家雖然處在共同的西方意識形態之下，但國家利益也不盡相同。

我們的傳媒選樣是目的性樣本，務求包括各地較具影響力的傳媒，同時盡量包括不同類型的傳媒，藉此增加對比的可能性。結果，我們從這 8 個地區中選擇了 32 家報紙、4 家雜誌、14 個電視頻道以及 7 家通訊社作爲訪問樣本（見附錄一）。

時間上，我們所分析的傳媒內容集中在交接儀式之前兩星期到之後一星期的時段內，即從 1997 年 6 月 16 日到 7 月 5 日。由於通訊社的新聞太多，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進行分析，只是訪問了一些通訊社人員（通訊社名單見附錄一），並已將由此得到的觀察納入我們的分析之中。

二、與新聞工作者訪談

從以上傳媒機構樣本中，我們總共訪問了 76 個新聞工作者，其中 37 個來自印刷媒體，29 個來自廣播媒體，另外 10 個來自通訊社（見附錄二）。除澳大利亞以外，各國的分布相當均衡。大多數訪談是在一個半結構化的訪談提綱下進行，每個訪談歷時 30 到 180 分鐘，全部都有錄音和筆錄。小部分訪談採取的是一種相對隨意的談話方式。

訪談的目的在於了解記者和編輯的工作模式，希望從中抽象出馴化的策略及影響馴化的因素。我們問及的內容包括他們的專業經歷、工作環境、新聞來源、組

織規範、競爭狀況、受眾對象、話語行爲（即如何調動主題、框架、影像和比喻等來講述新聞故事）和理想的新聞故事等。我們也詢問了他們在主權交接當天的報導計劃，包括如何分工、安排新聞來源及面對競爭壓力等問題。

三、內容分析

除訪談以外，我們還仔細地閱讀了有關的新聞報導，藉此檢視我們通過訪談而獲得的資料。在量化分析方面，我們想探討的限於兩方面：一是傳媒新聞的來源分布；二是傳媒對香港將來的估計。我們認爲，如果馴化真的存在，那傳媒在上述兩方面都會有相應的變化。首先，他們會倚重本國或友好國家的新聞來源。馴化是以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等作爲依據的，所以我們預期各國傳媒在對香港將來的猜估都會因國家地區而變易。總的來說，自由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的傳媒--傾向對中國和香港的將來存疑。

由於部份報導的新聞來源太多，我們只編碼每篇新聞報導的前 10 個，並按其國籍和社會地位（官員、政治意見領袖、商業菁英、傳媒和新聞工作者、大學教師和智囊團、其他類型的意見領袖以及普通人）分類。

至於香港前景的展望，每一則新聞報導有三種可能：(1)提到會發生變化，(2)提到不會發生變化，(3)根本沒有提及會否變化的問題。假如一個故事提到可能會發生變化，又有四種可能：(1)向好的方向變化；(2)部分變好，部分變壞；(3)向壞的方向變化；(4)很難確定如何變化。此外，我們還分析會變化的具體內容，歸入下面項目：(1)香港的自主性；(2)民主；(3)新聞自由；(4)法律；(5)經濟；(6)日常生活。

我們對來自 7 個地區的 26 家傳媒做了內容分析（見附錄一），共涉及 3,880 篇報導。因爲我們之中沒有人懂日語，所以量化內容分析沒有包括日本報紙。不過，我們請了一位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傳播學者協助閱讀和觀看那些被抽到的新聞報導。他翻譯了每則報導的標題並爲我們記下了每則報導的主題摘要，我們從而得知日本報導的概況。

在定義了編碼的變量後，經三輪試驗才最後確定編碼方案。編碼的工作由我們四位作者負責。結果，對「事實性」變量（比如新聞來源）的編碼可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爲 90% 以上，而對「主觀」變量（比如香港會否「變化」）的編碼可信度也在 80% 以上。

參、馴化策略

爲了增進傳媒的效率並緩解外部壓力，傳媒組織發展出一些專業常規--如以新聞來源說話和對權勢人物的倚重等 (Tuchman, 1978; Gans, 1979)。「馴化」很多時候是透過這些新聞專業常規來進行。新聞工作者們通常已經把傳媒組織以及本國文化對於外國現實的界定內化，使他們能夠順利完成新聞任務而不必有意識地去考慮專業規範和專業價值。首先，在報導重大事件時，編輯部門往往主動選派明星主持人、知名評論家和專家飛往那些遠離本土的異域，讓他們在外國的現場向受眾作「目擊」報導，試圖拉近彼此的距離。如在這一次的美國電視新聞報導中，儘管美國電視新聞主持人缺乏中國和香港事務方面的知識，但仍被委以報導香港主權移交的重任。一位臺灣電視主持人也承認，自己並不太了解香港，但是由於自己的知名度高，較受觀衆歡迎，還是被派來香港「壓陣」。

另外一個重要的馴化手段是依賴傳媒所屬國家的高級官員。官員總是比較引人注目，而且他們往往被看作是政治機構的代表，由他們來講述國際新聞，自然就可以帶出外國事件與本國受眾的相關性。那些擁有國際名聲和影響力的人物，比如英國的布萊爾 (Tony Blair)，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奧爾布萊特 (Madeleine Albright) 和彭定康 (Chris Patten)，因而成了他們國家傳媒爭相採訪的對象。容後我們從內容分析看到，傳媒訪問自己國家官員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

除了官員，傳媒也會讓「普通人」發聲，尤其是那些遠離家鄉或與家鄉還有各種關聯的「自己人」。San Jose Mercury News 的 Kristi Khockshorn 就專門尋找來自 San Jose 或者舊金山的旅遊者作爲採訪對象。她告訴我們，在索馬里採訪時她曾經手拿「San Jose」的標誌迎着坦克車隊，每隔幾分鐘就高聲叫喊有否來自「San Jose」的人。她這次在香港主權回歸之夜也準備找幾個「同鄉」訪問。華裔在加拿大的影響力近年已有增加，使得在這次香港主權移交的報導中，加拿大傳媒也不斷地尋找原籍香港的加拿大華人作爲新聞來源。

像普通新聞一樣，國際新聞也有「軟硬」之分。硬新聞的來源主要靠官員，而軟新聞則主要靠在地的市民大眾。不少國際新聞記者所嚮往的是寫出「有色彩」的故事，即是採用個人軼事來訴說引人入勝的新聞故事。他們認爲這種富有色彩的故事可以有效減少受眾對「遠方」新聞的抗拒。對於上面的 Kristi Khockshorn 來說，一個「色彩繽紛的故事」能給人「一種地方感」，使人覺得說話的是「活生生的人

而不盡是官員」。她認為，人們通常會更喜歡那些由「真正的人」構成的故事。加拿大 MacLean 雜誌的 Chris Wood 也認為讀者們喜歡混和着「色彩」和「質地」(texture) 的故事，因為它們會為故事帶來「形像、音響、氣味和聲音」。1997 年 6 月 19 日的《紐約時報》封面刊登了一則 Edward Gargan 採寫的新聞故事，描述幾個來自不同階層的家庭（教師、服務員和企業家）的故事，那無疑是以「色彩」和「質地」向讀者展示香港橫切面的嘗試。另外，為了捕捉交接儀式後頭一天的社會情緒，《紐約時報》的 Seith Faison 訪問了在街頭麵攤吃麵的幾個顧客。同理，《芝加哥導報》則訪問了一些對主權移交感到非常難過的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殖民者」。《華盛頓郵報》也有不少這樣的故事，在 6 月 5 日發表了一則特寫，將一個擁有時尚意大利餐館的前中國難民與她的在上海過著像夢魘一樣不愉快生活的姑姑進行比較。這些都是以「色彩」和「質地」說話的新聞故事，是馴化常用的招數。

另一個拉近遠方事件與本國受眾關係的策略，是把新聞故事個人化並賦予普世價值或本國意義。我們在訪談中問記者，什麼報導才是他們心中最理想的。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都認為最好的報導是個人化的，因為只有這樣，報導才能引起本國觀眾的共鳴和注意。英國廣播公司的主管 Fiona Anderson 曾說：

我的同事們採寫了一個令我感動流淚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在最困難的五、六十年代跨越邊境來到香港。我的同事們跟隨他拍攝，與他談話，談論他在香港過去的日子。他的家境目前已經很好，女兒和兒子都是在香港的銀行任高級主管。這位父親從未放棄任何機會，他為孩子們打下了基礎，讓他們發展自己，現在孩子們已可以回過頭來照顧父親。我的同事們拍了一段他星期天和孫子一塊兒吃飯的鏡頭。我覺得，這就是香港人：他們始於一無所有，白手興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這裡。這確實是一個美麗的故事，因為它講述了香港的精神。

這則報導顯然被賦予了「普世」的人性價值，該記者也預期國內的受眾會對故事產生移情作用。

以軼事細節說故事是馴化軟性國際新聞導的手段，但是簡化則是馴化硬性新聞常用的手法。受眾對外國的認知有限，加上興趣不高，如報導太詳細複雜，往往難以忍受，是以記者必須去繁就簡。例如，「香港臨時立法會」產生的背景複雜，當中牽涉到中英雙方就政制應否有「直通車」的長期爭論，不少傳媒對有關問題都避

而不談，就算要提及，也是將它標籤為「由北京任命的臨時立法機構」（《華盛頓郵報》語），藉此避開當中的複雜性。自由和民主原本也是相當複雜的問題，但是在國際記者的手下也變成了非黑即白的簡單事件，是以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和劉慧卿莫不成為西方傳媒眼中的英雄，而香港的左派代表則成了對立面。這種簡約的做法使本國的受眾較容易把握事件的意識形態線索，增加閱讀和觀看的興趣。當中的原則，正如 CNN 記者 Mike Chinoy 所言，新聞報導應有明確主線，避免過於細節化而造成理解困難，新聞記者必須意識到「自己是在向那些並不一定了解香港的人講故事」。

把遙遠事件放在較大的歷史情境中報導，是另一個突顯相關性的常用辦法。一向以高度詮釋性報導而非以事實性報導為主的《紐約時報》，集中探討的就是香港將來在中國統治下的命運。CNN 的 Mike Chinoy 認為，一個新聞記者必須「不斷地回到那些重要議題」上來，並且必須「力圖將本土的事件放到更廣闊的視野之內進行考慮」。他主張不應該把香港主權交接僅看作是乏味的地方政治，而應將它與中國以及中美關係聯繫起來考慮，從而突顯事件的重要性。他舉例說：

當時我正在準備一個關於住房的報導。雖然這是個有趣的題材，但它卻不大可能構成國際新聞。只有當人們開始鬧事並燒毀房屋的時候，它才可能成為一則國際新聞。不過，住房委實是香港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只有當我們把有關問題看作是香港特首董建華領導能力的考驗……這才構成一則國際新聞，而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性消息。我只有將故事放在這種背景之下進行報導，那些遠在阿根廷的人才有可能對報導感興趣。

國際新聞比較難理解是因為受眾一般缺乏背景知識，所以記者若能把國際事件接上本國的參考框架，馴化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在報導外國新聞事件時，記者們很自然地會從個人的參考框架出發，而這個框架則是建基於他們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對本國文化中的同類事件、歷史案例以及同等概念的理解。他們繼而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比較，找出相似性，運用各種比喻來闡明這些外國事件對於本國的意義（Cohen, 2002）。1997 年夏，世界不少傳媒都將香港當時興旺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當作是香港將來繼續繁榮穩定的經濟支柱，只有日本的新聞記者將同樣的「資料」解讀為「泡沫經濟」爆破的前夕，而這一點終於在同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應驗。很顯然，日本新聞工作者的洞察力或「遠見」主要源於過去十年日本自身泡沫經濟爆破的痛苦經驗。一位來自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對過去共產主義時

代的政治鎮壓則記憶猶新，因而對香港的前景極不樂觀。部份美國新聞工作者對於香港的看法則主要受到留存記憶深處、揮之不去的天安門廣場鎮壓景象以及受到長期冷戰的影響，因而把香港的主權移交看作是香港這個美麗資本主義都市走向衰落的開始。記者對事物的看法有時比較強，影響他們所能看到的新聞，有時甚至導致對新聞「劇情」的預期，進而影響他們的報導。例如，不少西方傳媒都曾猜測中國大陸政府將會在收回主權後，隨即給敢言的《蘋果日報》來個下馬威，甚至關閉它，因而紛紛採訪該報，雖然這些報導最後都沒有成為事實。這些新聞在香港看來或屬過敏，但對記者本國的受眾而言，大概又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總的來說，馴化的要義在於設法「激活」新聞，使乏味的新聞變得吸引人，使遠在天邊的事情與受眾發生關係。開首時，我們提過《新聞周刊》以兩個封面故事來訴說香港回歸同一的事件，分別發放給國內外的受眾，可說是馴化的經典例子。

肆、影響馴化的因素

在各種影響馴化的因素中，國家利益大概是首要的，我們上面的論述中已有觸及。我們說過，國際關係是國際新聞核心的問題，而國際關係也總離不開國家利益。就訪問所得，有部份記者對他們國家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的理解，但也有不少並不自覺他們的國家利益。無論自覺與否，他們傾向依賴的新聞來源都是他們國家或是友好國家的高級官員，而這些高級官員無疑是國家利益以至於國家所屬陣營利益的詮釋者。由於國家利益具有相對穩定性，且是馴化國際新聞的根據，因此國家內部的差異就往往被掩蓋和忽略。國家利益屬於宏觀層次的因素，是基本的考慮點。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一些影響馴化的微觀因素，包括傳媒的類型、市場定位、組織約制和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認識程度。這些微觀因素也可以促成馴化不同的表現。

一、傳媒類型和市場定位

馴化的程度會因傳媒的類型和市場定位的不同而變化。如以簡化作為馴化的手段為例，報紙與電視所面對的壓力就有所不同。與報紙相比，作為視覺媒體的電視更喜歡採用令人興奮的動作鏡頭，通過影像向觀眾傳達意義，而不像印刷媒體那樣採用線性邏輯的方式敘述，這種視覺邏輯難以容忍靜止和單調的圖像，因而電視所見盡是語言敘述受到圖像排擠的現象。CNN的Mike Chinoy認識到這一點，他說電視並非一種善於「傳達微妙觀點」的媒體，因此新聞工作者必須克服各種技術限制

去「尋找視覺圖像並與人們對話」。電視收視率的競爭進一步促使新聞工作者將外國新聞簡化，因為傳媒都擔心觀眾不能容忍陌生的細節。一家澳洲電視臺的記者 Jane Hutcheon 贊同說，電視通過一系列的圖像以表達非黑即白的簡單觀點最為有效。相比之下，英報紙就不得不表現得更加有思想，為要求較高的讀者提供各種分析。

依對象市場大小劃分，傳媒可以簡單分為國際傳媒、全國傳媒和地方傳媒。CNN 的 Mike Chinoy 聲稱，由於 CNN 在全球播放，要同時滿足多種文化背景觀眾的需要，因此 CNN 新聞表現的是一種「全球觀點」，而不是美國的或是「任何個人」的觀點。像 CNN 這類國際媒體，它們的全球意識無疑比其他地方性的傳媒要強，但是它們的主要觀點還是受制於它們的主要市場--美國和西歐。在 CNN 報導中，來自第二和第三世界的觀點顯然相對不受重視。就我們所見，縱使是像 CNN 這種國際傳媒，它們還是以西方社會的文化和政治關懷來察看世界。它們的主要新聞人員所經歷的社教化過程大多是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進行，所關注的議題跟一般的西方傳媒大同小異。事實上，在另一個場合 CNN 世界報導的編輯們自己也承認 (Flourney, 1992: 23)，「如果我們說自己完全不帶觀點肯定也是不誠實的」。從我們有關報導的分析看來，CNN 和美國 CBS 的報導有局部的差異而無根本的區別，BBC 和英國 ITN 之間的報導也是如此 (Lee, Chan, Pan, & So, 2002)。當然，如果我們因為彼此缺乏根本的區別而抹殺當中的差異，也是過猶不及的說法。

二、組織的約制

傳媒動用大量資源派記者採訪國際事件，對記者自然有組織上的要求，而這種要求往往是透過編輯來執行的。當新聞報導的主題符合本國的編輯和受眾的先入之見時，新聞的馴化過程一般都會較順利地完成，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記者無需設法證明自己所採寫的新聞故事是合理的。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尤其是那些 Tunstall (1971) 稱之為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記者」的人，總是得到編輯的信任，並享有較高的自主性--他們彼此畢竟享有共同的專業意理和組織文化 (Breed, 1955)。《紐約時報》曾駐北京和新德里記者 Edward Gargan 很驕傲地告訴我們，他的五個同事都懂得怎樣「深入到故事的表層之下」，而不會採寫一些「陳腔濫調的故事」，Gargan 和《每日電訊報》的 Graham Hutchings 等都強調，他們能夠控制新聞議程，很少受到本國編輯的干涉。當倫敦《泰晤士報》的 Jonathan Mirsky 被問及是否受到編輯的干涉的時候，他迫不及待的糾正我們說：「我的任務不是由人指派的，採寫甚麼由我決定。」

可是，不是所有的記者都有如此大的自主性，《華爾街日報》的 Joseph Kahn 就認為編輯在決定如何報導、以及報導什麼方面有更大的影響力：

只要你能將事情的實質通過一種流暢、生動和有趣的方式表現出來，編輯就一定會有興趣。但是如果你為了追求信息的絕對準確，而通過一種乾巴巴的、事實堆積的方式報導，編輯一定會說：「噢，我可沒興趣。」太乏味了，這就是編輯的作用。他們希望你成爲一個具有煽動性、明智和有利的作者。

當然，經驗豐富的編輯往往會擁有更多權威。曾留駐香港十年的加拿大 MacLean 雜誌的國際編輯 Chris Wood 就對自己新聞判斷很有自信。不過，他還是避免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記者，而只會和記者們商議。這些例子說明，前線記者與本國的編輯的關係不可一概而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傳媒組織對馴化的要求，不是透過編輯來實行，就是透過記者內化了的價值來實現，差異只在於由誰來判別馴化是否做得適當而已。

三、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認識

採訪國際事件的記者可以是常駐記者，也可以是「空降」的特派記者，當中身份的差異往往反映出彼此對新聞發生地點了解的程度，而了解的深淺又會影響到馴化的方向及幅度。1997 年夏，各家傳媒都臨時從他們的北京分社或是從總部派出記者「空降」香港，有些記者純粹是爲了香港主權移交而來，有些則是藉此增強常駐記者的力量。由於空降記者對香港的語言和文化不熟悉，因此在同一時段報導眾多事情相當困難，不得不求助於本地傳媒以即時了解事情。他們建立了各種聯盟，經常與非競爭對手的同行交流新聞，尤其喜歡與來自其他國家或是不同類型的媒體的同行交流，相互幫助。缺少資源的新聞工作者更大大依賴各種機構安排的訪問、研討會和座談會等，以獲得新聞資訊。許多記者還真的報導了由政府新聞署安排的記者團活動，使得多家傳媒常不約而同地報導同一件事，如香港的「籠屋」就曾受到不少國際媒體的青睞。所謂「籠屋」，指的是一些香港人住的地方像鳥籠一樣擁擠。經過香港社會服務組織的安排，「籠屋」因此成了國際新聞。由此可見，空降的記者在馴化過程中，受到事件有關人士左右的可能性比較大。

空降的記者來去匆匆，根本無暇深入認識採訪對象，只能依預存的觀點行事。在現場觀察中，有一位來自美國中西部一家頗有聲望的報紙記者曾引起我們注意。

她從北京飛達香港當天就立即趕往外國記者俱樂部參加座談會，在演講間歇回答聽眾提問時，她便倉促地向其中一位親北京的銀行家講者提出了有關土地價格的問題。迅速而潦草地記下這位銀行家熱心但卻沒有針對性的回答後，她就立即離開，沒再接著聆聽其他更具實質的內容。她可能是去整理剛剛採訪這則新聞，也可能是去尋找其他新聞。我們後來查看了其所發的相關新聞，無論是從那種角度看，報導都是「膚淺」的，可算是簡單的馴化。

常駐記者比臨時的特派記者有較廣的訊息網，對當地情況較為掌握，馴化的結果有時因而不同。如美聯社香港分社主任 Marcus Aliason 這位自認為是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就告訴我們，他個人的觀點曾因對香港的了解增多而轉變。他說，雖然中國未必在各方面都能夠貫徹政策，但他確信中國大陸會執行「一國兩制」的構想，不會把共產主義強加於香港。他也沒有像許多西方傳媒一樣批評中國政府解散原立法會的行爲，反而認為記者應該解釋爲什麼彭定康沒有徵求中國同意就改變了遊戲規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常駐北京的記者往往也受到他們經歷的影響。比如他們對於中國及其領導人的了解，常使他們懷疑香港的前途。主權交接儀式前，持最懷疑態度的新聞記者就是那些曾經在北京工作過及曾目睹 1989 年春天中國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記者們。

1989 年，爲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而震驚的美國 CBS 主播 Dan Rather 曾經向全世界聲言：「中國永將不一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CBS 新聞部已有二十年沒有在香港設立派駐機構，九十年代以來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遷也沒有足夠關注。然而 1997 年，Dan Rather 八年來首次帶隊回到北京，爲這一次的香港報導定調而將香港主權交接與 1989 年流血事件聯相提並論，增加了香港回歸作爲「天安門事件續集」的意味。

雖然，CNN 及 CBS 對香港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大體關注相同的，但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則因記者的經歷和識見而有出入。Mike Chinoy 這位 CNN 駐香港的中國區主任這樣說：

讓我引以爲豪的是 CNN 並沒有像其他同行那樣，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看作是送羊入虎口，認為香港將來會受到北京屠夫的侮辱，而是採取了一種慎重報導角度。我們對即使是像中國軍隊進駐香港這種事情上也很冷靜，這主要得益於我在中國的經驗。對我來說，許多媒體對於中英之間在駐軍問題上的爭端都過於大驚小怪了，這一問題其實很明顯是與中國人的面子、

主權和洗雪歷史恥辱有關。雖然有些媒介把解放軍進駐香港看作是對香港的踐踏……，但我的主要感覺是，中國其實是想讓大家都明白，它有權在此駐軍，這是體現主權的問題。我覺得，在中國的經歷使得我能夠明白這一點對於中國的情感是多麼重要。

CNN 的 Chinoy 與《華爾街日報》的 Joseph Kahn 兩人都曾在 1989 年以後經常訪問中國。他們說有關經歷使他們比較能夠看到中國「正面的」和「樂觀的」一面，故能對香港回歸的問題有較「全面」的看法。當然，誰的看法較「全面」，不完全由我們決定，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愈是有經驗和識見的記者愈能在馴化的過程超越他們本國的刻板觀點。

伍、內容效應

如前所述，我們無意在這裡以量化分析全面檢視馴化各種內容效應。我們的檢視範圍只限於兩方面：傳媒的新聞來源和傳媒對香港前景的看法。由於新聞「馴化」的普遍存在，我們預期來自不同國家的傳媒在上述兩方面呈現系統性差異，跟它們所屬國家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互相呼應。以下是內容分析的結果，情況大體跟我們預期的接近。

根據馴化假設，來自一個既定國家的傳媒傾向使用該國的新聞來源。如果那個國家的新聞來源不符合事件的需要，傳媒則會尋求和自己國家最相近的新聞來源。表一列出的是按國籍分類的新聞來源。整體地說，香港的新聞來源最受中國以外各地傳媒的歡迎，當中包括加拿大（62.8%）、香港（62.5%）、英國（49.7%）、美國（48.0%）、澳洲（42.2%）和臺灣（34.9%）。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香港是回歸的主角，加上香港能講英語的人很多，更有接受採訪的自由。比較特別的是中國大陸最多採用的新聞來源是中國大陸本身（44.7%），比香港新聞來源（33.8%）多出超過十個百分點，當中的差異很有可能反映了香港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權力差距，因為大陸傳媒一向更多地以權力大小劃分新聞性。於它們而言，北京與香港不可相提並論，而它們又是政府喉舌，自是首先向着中央。

表一：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來源的百分比 (%)

新聞來源 \ 傳播媒體	中國大陸傳媒 (N = 767)	英國傳媒 (N = 880)	香港傳媒 (N=1795)	臺灣傳媒 (N = 470)	美國傳媒 (N = 757)	加拿大傳媒 (N = 196)	澳洲傳媒 (N = 344)
中國大陸	44.7	12.3	14.8	15.1	15.9	7.7	11.1
英國	3.5	23.0	8.8	8.9	14.0	9.7	13.1
香港	33.8	49.7	62.5	34.9	48.0	62.8	42.2
臺灣	0.5	3.8	3.9	28.9	4.6	1.0	8.7
美國	2.0	3.9	4.5	7.0	13.9	1.5	4.7
其他亞洲國家	6.8	1.3	1.6	2.8	1.1	1.0	3.8
其他非亞洲國家	8.7	6.3	4.0	2.3	2.6	16.3	16.6

如果比較各地傳媒自我引用新聞來源的情況，我們發現，這種傾向最明顯的首推香港（62.5%）和中國大陸（44.7%），其次是英國（23.0%）和臺灣（28.9%），所佔的百分比僅次於香港新聞來源。至於美國傳媒，來自本國的新聞來源只佔 13.9%，馴化的跡象不算明顯，而加拿大和澳洲傳媒的情況也相似。不過，這三個國家則頗重視來自文化相近的英國的新聞來源，平均超過百分之十，這也可看作是馴化的間接反映。

如果我們把傳媒的官方新聞來源抽出來，那馴化的跡象就會變得更為清楚。表二列出的是傳媒對官方新聞來源的倚重情況。中國傳媒中有超過一半（53.6%）的官方新聞來源來自本國，有 24.7% 來自香港。本國的官方新聞來源在臺灣（40.2%）、英國（39.4%）和美國（18.4%）傳媒中也相當突出，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都很關心香港的主權移交對於他們各自國家地區利益的影響。西方陣營中兩個相對邊緣的成員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傳媒，則使用了相對高比例的英國的官方新聞來源，分別是 29.8% 和 20.1%。美國在這方面也不甘後人，佔有 29.0%。

表二：來自不同國家的官方新聞來源的百分比 (%)

新聞來源 \ 傳播媒體	中國大陸傳媒 (N = 263)	英國傳媒 (N = 388)	香港傳媒 (N = 706)	臺灣傳媒 (N = 214)	美國傳媒 (N = 207)	加拿大傳媒 (N = 47)	澳洲傳媒 (N = 164)
中國大陸	53.6	16.2	18.4	18.7	20.3	8.5	12.8
英國	5.7	39.4	17.4	11.7	29.0	29.8	20.1
香港	24.7	28.1	44.2	17.3	21.3	40.4	25.0
臺灣	0.4	5.2	6.9	40.2	6.8	4.3	14.0
美國	1.9	4.1	6.2	7.9	18.4	4.3	4.9
其他	13.7	7.0	6.8	4.2	4.4	12.8	23.2

我們曾逐一具體分析各國傳媒中 10 個最常被引用的新聞來源，結果進一步肯定了傳媒嚴重倚重本國的官方新聞來源的預期。中國傳媒所引用的新聞來源中，頭 10 個就有 6 個來自本國，包括江澤民、李鵬、錢其琛、喬石、崔天凱和新華社。彭定康則位列英國傳媒新聞來源之首，其次是外交部長庫克 (Robin Cook)，首相布萊爾 (Tony Blair) 和外務部。臺灣傳媒則將注意力集中在駐香港代表鄭安國、副總統連戰及其他官員辜振甫、李大維和張京育身上。美國傳媒增加了國務卿奧爾布萊特 (Madeleine Albright) 和總統克林頓作為主要新聞來源。加拿大傳媒的新聞來源名單上也增加了其外務部長 Lloyd Axworthy 和駐香港專員 Garrett Lambert，澳大利亞傳媒所常引用的新聞來源中，其外交部長 Alexander Downer 也在其列。

表三列出的是各國傳媒對香港前景的評價，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極為明顯的模式：中國傳媒與世界其他國家有顯著的差異。中國傳媒一律報導香港在每一方面都不會發生變化；要變化也只可能向好的方面變化。它們迴避了一些實質性事件的報導，著力於報導種種舉國歡慶的場面。相反，來自其他社會的傳媒卻都預言會發生變化。四個英語傳媒體系--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比香港和臺灣傳媒更多提及變化，其中部分原因可能由於西方傳媒傳統上傾向更多詮釋性報導，並且更傾向於將西方的民主和人權價值觀與共產主義的集權主義價值對立。香港和臺灣的傳媒似乎較現實，主要考慮的是如何保存兩地的自主性，而不是與北京共產主義政權展開原則之戰。以下列出的是分別在各具體領域中預言有變化的最高比例國家：

表三：各國傳媒對移交後香港變化的展望

傳播媒體	自主性	民主	新聞自由	法律	經濟	日常生活	總數 (N)
認為會有變化的百分比 (%)							
中國大陸傳媒	0.0	0.8	0.0	0.1	3.6	1.4	739
美國傳媒	15.2	34.8	14.0	10.4	7.6	13.7	328
英國傳媒	6.6	23.4	7.7	1.4	2.6	3.1	351
香港傳媒	5.8	11.2	3.1	4.7	3.9	4.2	1351
臺灣傳媒	3.6	6.6	2.2	1.2	3.2	3.0	500
澳大利亞傳媒	6.6	36.5	10.2	10.9	4.4	8.0	137
加拿大傳媒	9.5	28.6	2.4	7.1	13.1	16.7	84
在提及變化的報導中，認為會變壞的百分比 (%)							
中國大陸傳媒	0.0	0.0	0.0	0.0	0.0	0.0	44
美國傳媒	27.5	73.7	54.3	50.0	0.0	57.8	314
英國傳媒	34.8	61.0	51.9	40.0	11.1	54.5	157
香港傳媒	38.0	41.7	36.6	34.4	9.4	15.8	444
臺灣傳媒	33.3	45.5	45.5	66.7	6.3	25.0	99
澳大利亞傳媒	44.4	62.0	42.9	53.3	16.7	8.3	105
加拿大傳媒	0.0	58.3	50.0	50.0	18.2	21.4	77

- 民主：澳大利亞 (36.5%)、美國 (34.8%)、加拿大 (28.6%)、英國 (23.4%)。
- 新聞自由：美國 (14.0%)、澳大利亞 (10.2%)。
- 法律：澳大利亞 (10.9%)、美國 (10.4%)。
- 香港的自主性：美國 (15.2%)、加拿大 (9.5%)。
- 日常生活：加拿大 (19.7%)、美國 (13.7%)。
- 經濟：加拿大 (13.1%)、美國 (7.6%)

顯然，香港在民主和各種公民權利的變化備受世界各國傳媒--尤其是西方傳媒--的關注。當進一步考察變化是變好還是變壞時，在英語國家的傳媒體系中，不少傳媒都認為除了經濟以外，各個方面都會變壞。以民主為例，美國傳媒看來是論調最為悲觀，其次是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再其次是臺灣和香港自己。上述種種結果與從馴化假設推斷而來的預期是相符的。

我們事實上對各國傳媒的報導也做了定質話語分析（Lee, Chan, Pan, & So, 2002），結果更進一步說明馴化的存在。簡單地說，英國傳媒突出的主題是大英帝國光榮的撤退和對往日光輝歲月的緬懷。美國的傳媒大張旗鼓，為香港的民主搖旗吶喊（Lee, Pan, Chan, & So, 2001）。中國大陸傳媒標榜洗脫百年國恥和全國歡慶統一。臺灣傳媒忙着拒絕一國兩制的誘惑。加拿大和澳洲的傳媒一方面試圖表示自己的獨立外交姿態，同時也像英美傳媒一樣關注香港未來的民主和自由。日本傳媒關注的則不在民主而在香港以至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報導主題的異同更能反映各國的外交路線、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而這些正是馴化基本的依據。

陸、結論

「相關性」可說是新聞價值的核心，因為受眾對無關的事情只會漠不關心，如何使發生在遠處的新聞事件對本國的受眾產生意義，這是我們想探討的主要問題。我們嘗試發展「馴化」的概念，用以概括傳媒拉近外國事件與本國受眾關係的過程。本研究透過各國新聞工作者對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這個全球性事件的報導，來分析他們如何「馴化」新聞事件及對內容的影響。

我們發現，馴化已成了國際新聞生產的內在邏輯，而馴化的策略則源自新聞常規。這些常規也適用於國內新聞的生產，但是對國際新聞的作用更大，因為國際新聞記者與受眾之間在地理上和視野上都有較大的距離，如何縮短彼此距離更形重要。用 Flounoy（1992: 23）的話說，國際新聞記者的工作就是「在一個不熟悉的甚至常常是混亂的處境中尋找故事，並根據他們對國內的編輯和受眾的喜惡作出判斷，賦予故事一個引人入勝的新聞角度」。這就是馴化的根本作用。

激活新聞是馴化的基本策略，這當中包括派明星主持人趕赴新聞現場作目擊報導和宣傳造勢，藉此引起哄動，吸引受眾。另一個常用的馴化手法是把外國事件放到一個較大的情境中去報導，試圖增加事件的重要性和強化本國受眾對事件的理解力。在表述上，國際記者常用本國文化中的案例及相近觀念來對比外國事件，盡量把外來事件納入本國的文化政治框架之中。以本國的高級官員作為新聞來源是馴化另一常見招數。國際新聞多數牽涉國際關係及國家利益，若由有關官員來詮釋，對記者及受眾來說自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就算是以平民百姓作為新聞來源，國際記者也會盡量用本國的。不過，國際新聞不竟是以外國事物為主要報導對象，如何利用外國新聞來源也要視乎馴化的效用。遇到「軟性新聞」，國際記者喜用的策略是把

新聞故事個人化，賦予人性或本國文化意義，再加上豐富的軼事細節，以令受眾產生移情作用。但是在「硬性新聞」方面，過多的細節卻會引起國內受眾的抗拒，簡單化反而是更較符合馴化的策略要求。

各國新聞記者在製作國際新聞時往往以他們自己國家的政治權威結構、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作為依據。這些宏觀因素的影響是基本的，但是馴化也會為一些微觀因素所左右，當中包括傳媒類型、市場定位、組織約束、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了解程度以至記者的經歷和識見。舉例說，電視就比報紙更傾向以簡單化作為馴化的策略；跨國傳媒比地區傳媒傾向避免定於一國的馴化策略；愈是肯花資源派記者採訪國際新聞的傳媒，愈是希望得到有本土視角的新聞；記者的經歷和識見可以影響到馴化的程度和方向，而洞識力的深淺跟他們是駐地記者還是特派記者又會有莫大的關係。

我們另一個發現是，媒介意識形態在國家之間的差異要比國家內部的差異顯著得多。所有新聞的製作都是通過資訊的選擇以及通過使用特定意義框架來實現，而國際新聞往往是從本國的角度進行定義，與該國的國際政經關係、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符號以及權威結構密切相關，是以被馴化的國際新聞所顯示的意識形態往往比國內新聞所顯示的更為狹窄和單一。對國內事件，不同黨派較有可能存在意見差異，但是在國際事件上，有關的矛盾則常常轉化為對國家政策的一致支持和擁護。有論者認為，全球化會導致世界大同，但從國際新聞馴化的普遍性看來，國族的觀點還非常盛行，至少在新聞方面是如此。

「馴化」是新聞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連接機制。Robertson (1995) 「球土化」(glocalization) 的概念最能概括地方新聞的全球性生產。如前所說，馴化在意念上跟本土化大概是相通的。不過，馴化的概念多應用在新聞文本而本土化則多應用在別的本土化文本上。究竟不同文本的本土化過程是否一樣，所牽涉的因素是否相同，這都需要做大量比較研究才能確切回答。我們相信當中有一個層次的問題，在較高層次上相同的地方會比較多，可能彼此都會涉及「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和「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 等過程，但一旦落到具體分析，相異的地方就會多起來。我們也相信，如能把馴化與一些像本土化和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的相關概念進行對比研究，也會深化我們對馴化的認識。

我們曾初步指出一些影響馴化的因素，這些因素的改變會如何改變馴化的過程以至內容，這也是可以再深入探討的問題。例如，由於跨國傳媒的出現和新聞客觀中立迷思的影響，「全球新聞觀點」之說有興起的跡象。長遠來說，跨國傳媒與地

方傳媒中的馴化過程會否有差異？傳媒的競爭愈來愈激烈，究竟競爭會導致馴化的減弱還是加強？我們的研究以香港回歸作為案例，這個案例帶有國際政治的色彩，若然案例的性質改變，馴化的過程會否不同？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繼續研究。

馴化是從 domestication 翻譯過來。從英文看，這個概念沒有甚麼貶意，但是中文「馴化」一詞時卻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負面聯想，因為它可能意味着原本處於自然狀態的新聞受到人為的干擾，不理人們對客觀新聞的追求。事實上，新聞客觀中立的神話早已被解構（例如：Tuchman, 1978; Gitlin, 1980; Gans, 1979），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再貶低它；而我們也相信，馴化是一客觀存在的社會過程，沒有甚麼好不好的問題。但是由於馴化最終會表現為新聞內容並產生社會效果，我們當然還是可以對馴化有所評價，盡量減少因馴化而產生的訊息扭曲或新聞噪音。至於評價的標準為何，這就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了。根據我們的發現，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馴化過程中，對新聞發生地點了解愈是深入的記者，愈能超越他們本國觀點的困囿。

參考書目

- Bennett, W. L. (1990). 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103-125.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326-335.
- Chan, J. M., & McIntyre, B. T. (2002). Introduction. In J. M. Chan & B. T. McIntyre (Eds.), *In search of boundaries: Communication, nation-stat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pp. xiii-xxvi). Westport, CT: Ablex.
- Cohen, A. A. (2002). Globalization ltd: Domestication at the boundaries of foreign television news. In J. M. Chan & B. T. McIntyre (Eds.), *In search of boundaries: Communication, nation-stat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pp. 167-180). Westport, CT: Ablex.
- Cohen, A. A., Levy, M. R., Roeh, I., & Gurevitch, M. (Eds.). (1996). *Global newsrooms, local audiences: A study of the Eurovision news exchange*. London: J. Libbey.
-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nsterheim, H., & Tresselt, M. (1953). The influence of value system on the perception

- of peopl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93-98.
- Flournoy, D. M. (1992). *CNN world report: Ted Turner's international news coup*. London: John Libbey.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 Giddens, A. (1991).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Hall, S. (1974). Devianc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In P. Rock & M. McIntosh (Ed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pp. 261-305). London: Tavistock.
- Hallin, D.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 Gitlin, T. (1994). The Gulf War as popular culture and television drama. In W. L. Bennett & D. L. Paletz (Eds.),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pp. 149-16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 C. C., Chan, J. M., Pan, Z., & So, C. Y. K. (2002). *World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C. C., Pan, Z., Chan, J. M., & So, C. Y. K. (2001). Through the eyes of US media: Banging the democracy dru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 345-365.
- Lee, C. C., & Yang, J. (1995). National interest and foreign news: Comparing U.S. and Japanese coverage of a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Gazette*, 56, 1-18.
- Pan, Z., Lee, C. C., Chan, J. M., & So, C. Y. K. (1999). One event, three stories: Media narratives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in cultural China. *Gazette*, 61, 99-112.
- Robertson, R. (1995).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pp. 25-44). London: Sage.
- Schlesinger, P. (1978).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London: Constable.
- Scholte, J. A. (1996). Beyond the buzzword: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In E. Kofman & G. Youngs (Eds.),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43-57). New York: Pinter.

- Sreberny-Mohammadi, A. (1991).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118-138). London: Edward Arnold.
- Sreberny-Mohammadi, A., Winseck, D., McKenna, J., & Boyd-Barrett, O. (1997).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Media in Global Context. In A. Sreberny-Mohammadi, D. Winseck, J. McKenna,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in global context: A reader* (pp. ix-xxviii). London: Edward Arnold.
- Tomlinson, J.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 W. M. (1991).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120, 2, 1-32.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s,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London: Constable.
- van Ginneken, J. (1998). *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Wang, G., & Servaes, J. (2000). Introduction. In G. Wang, J. Servaes, & A. Goonasekera (Eds.), *The new communications landscape: Demystifying media globalization* (pp. 1-18). London: Routledge.
- Wang, G., J. Servaes, & A. Goonasekera (2000) (Eds.), *The new communications landscape: Demystifying media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Waters, M. (1995).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附錄一：傳媒機構及內容分析樣本

國家	印刷媒介	電視	通訊社
中國大陸 (n = 8)	人民日報* 經濟日報 解放日報 光明日報 廣州日報*	中央電視臺* 廣州電視臺	新華社
美國 (n = 11)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 芝加哥導報* 洛杉磯時報* Des Moines Register* San Jose Mercury News 新聞周刊	CBS* CNN*	美聯社
英國 (n = 8)	泰晤士報* 衛士報* 每日電訊* 獨立報 金融時報	BBC* ITV*	路透社
香港 (n = 10)	明報* 南華早報* 蘋果日報* 東方日報 亞洲周刊(雜誌) 遠東經濟評論(雜誌)	TVB* CTV CTN	政府新聞署 ²
臺灣 (n = 7)	中國時報* 聯合報 中央日報 自由時報 民眾日報	TTV*	中央社
日本 (n = 7)	朝日新聞 讀賣新聞 產經新聞 日本經濟新聞	NHK Asahi	共同社

國家	印刷媒介	電視	通訊社
澳大利亞 (n = 2)	The Australian*	ATV*	
加拿大 (n = 5)	Globe and Mail* MacLean's (magazine)	CBC*	Canadian Press Southam News

- 註解：1. 我們對以上列出的所有印刷媒介和電視臺都做了定質的話語分析。加 * 號的表明另外還做了量化的內容分析。通訊社則以上兩種分析都沒有做。
2. 香港政府新聞署通過提供新聞、摘要、訪問安排及其他方式為國際新聞工作者服務。

附錄二：受訪新聞工作者的國籍及人數統計表

	印刷媒介	廣播電視	通訊社	總數
中國大陸	2	4	1	7
美國	7	2	1	10
英國	5	4	0	9
香港	7	4	0	11
臺灣	6	9	2	17
日本	4	3	4	11
澳大利亞	1	1	0	2
加拿大	5	2	2	9
總數	37	29	10	76

Domesticating International New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verage on the Hong Kong Handover

Joseph Man Chan*

Chin-Chuan Lee

Zhongdang Pan

Clement Y.K. So

ABSTRACT

How do journalists make sense of news events that happen elsewhere for their home audience? Focusing on a global event,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on July 1, 1997, this project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journalists domesticate such an ev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as expressed in content. Domestication refers to the way that journalists try to transform global events, through adaptation, into the relevance structure of national home audience. It is found that various nationally organized journalist communities rely on their own political authority structures, dominant political cultures, as well as cultural

* Joseph Man Chan and Clement Y. K. So are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respectively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Chuan Lee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e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Head and Chair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ongdang P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repertoire to make a global news event meaningful to domestic audiences. The process of domestication varies with media types,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 market positioning, and the journali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 of news occurrence. However, cross-media system comparison made possible by the scope of this project concludes that national differences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intra-national variations in media ideolog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news, domestication, news value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Hong Kong handover